

珞珈史学文库
LUOJIA SHIXUE WENKU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中日战争史研究 (1931—1945)

胡德坤 著

ZHONGRI ZHANZHENGSHI YANJIU



商务印书馆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中日战争史研究（1931—1945）

胡德坤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战争史研究：1931～1945/胡德坤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7364-6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中国—1931～1945 IV. ①K2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1273号

中日战争史研究（1931—1945）

胡德坤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364-6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1/4

定价：44.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集合。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

家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

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 年 2 月

目录Contents

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

——“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政策初探 1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原因浅析 21

“七七”事变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38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浅论 59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74

淞沪抗战时期中国对日政策研究 92

武汉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112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125

中国战场与日本的北进、南进政策 142

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37—1945)..... 160

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对德关系的演变 202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历史进程 218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中国崛起的开端 235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历史方向的转换 249

中国抗战与盟国的太平洋战争 269

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国面貌的正义战争 285

八年抗战中的敌后解放区战场 300

解放区战场发展成为中国抗日主要战场是历史的必然	319
中国抗战与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破产	331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中的地位和作用	345
中国与联合国的成立	362
二战期间日本在华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研究	373
美国与日本战争赔偿方式的演变	386
作者主要著述列表	403
后 记	409

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

——“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政策初探

1937年的“七七”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总战略中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变本加厉地推行全面灭亡中国的侵略政策，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

早在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就制订了征服世界的侵略计划。《田中奏折》明确指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就是说，征服中国是日本称霸世界的第一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并不是它侵略的终结，而是新的侵略的开始。“九一八”事变后，围绕着侵华问题，日本从国际到国内开始了紧张的战争准备。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29页。

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是日本走向大规模战争、称霸世界的主要国际障碍。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占领了中国山东，大有独吞独霸中国之势。一次大战结束后，美英利用华盛顿会议，强迫日本交出了在一战中获得的利益，退出了中国的山东，并限制其海军的发展。在华盛顿体系的束缚下，日本被牢牢地捆住了手脚，对此，日本极为不满。1927年，《田中奏折》大肆叫嚣，日本要征服中国，首要的条件是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因为“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此种难关如非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既不能巩固，国力自无由发展矣”^①。

1932年3月，日本拼凑了“伪满洲国”，企图把东北变成它永久性的殖民地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基地。1933年2月，国联讨论和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是绥靖政策的产物，它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和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却又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东北，于是只好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但日本法西斯野心勃勃，企图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它希望争霸而不受限制，侵略而不受谴责，连国联这一不痛不痒的指责也不愿接受。同年2月15日，陆相荒木贞夫在内阁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提出：“如果留在国联内，一切都要受到约束，限制了自由。只要退出国联，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干。……因此，此时只有决心退出国联，才能有自由的立场，才能开拓自由的天地。”^②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退出国联，27日，日本正式宣告退出国联。

1934年9月7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制订了参加伦敦裁军预备

①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3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

② [日] 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2·日中战争1》，东京：青木书店1971年版，第62页。

会议的方针，提出反对华盛顿条约规定的各国军舰按比率限定吨位的条款，主张各国军舰总吨位一律平等，并退出现有条约。在同年10月召开的伦敦裁军预备会议上，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谈判破裂。12月3日，日本内阁决定单方面废除华盛顿条约，同月19日正式通告美国。退出国联和废除华盛顿条约，是日本对一战后英、法、美所苦心经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它把英、法、美限制日本争霸的种种条约变成了一堆废纸，从而也就最后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排除了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国际障碍。为了同世界大国抗衡，日本积极对外寻找盟友。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有同样利害关系”的纳粹德国签订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这个协定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号，但它实际上既是针对苏联，又是针对美英的，它打着反共的招牌，是为了避免“刺激列国，过早地行使武力”。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本摆脱了华盛顿体系之后，又进入了另一个体系——法西斯阵营。从此，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开始沆瀣一气，遥相呼应，更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

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在国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疯狂地进行着战争准备。法西斯政权的确立，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提之一。日本法西斯是依靠战争和推行战争政策上台的。如果说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膨胀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那么，“九一八”事变便为法西斯的上台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给危机中的日本经济带来了生机。1932年，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指数下降到最低点时，日本就已开始回升，最早摆脱了危机。到1935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大大超过了1931年的23亿日元，达49亿日元，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出超。日本经济的这种景

气，是建立在对我国东北侵略的基础之上的，它为日本新老财阀都带来了福音。于是，不仅新财阀，连老财阀也转而支持法西斯的战争政策，成为法西斯的主要社会支柱。财阀的支持，是法西斯上台的决定性因素。“九一八”事变后到1936年的广田弘毅内阁时期，日本法西斯在经过一番与其他政治势力的生死搏斗和内部不同派别的互相倾轧之后，利用军部控制了内阁，再利用内阁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从而建立了法西斯体制，夺取了政权。法西斯上台就意味着战争的临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必将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随着法西斯的上台和战争政策的推行，日本经济日益军事化，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得到急剧发展。1930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4.5%，重工业占35.5%，轻工业占主导地位。1935年，轻重工业的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轻工业下降到47.3%，重工业则上升到52.7%。到1937年，轻工业进一步减少到42%，重工业激增到58%。从1936年广田内阁起，日本经济已进入准战时体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扩军备战，军费有增无已。1931年，军费为4.55亿日元，占岁出总额的30.9%；1936年，增加到12.37亿日元，增加了约2倍，占岁出总额的45.7%。军火工业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1931年，日本陆海军武器生产总额为0.868亿日元，1937年上升为7.815亿日元，增长了8倍。^①陆海军的兵力也大大增强了，从1934年到1937年，日本军队总兵力由45.7万人增加到107.8万人，增加了1倍以上。^②

日本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更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1936

① [日] 原朗：《战时统制经济的开始》，《日本历史20·近代7》（岩波讲座丛书），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249页。

② 同上，第240页。

年8月7日，广田内阁制订了以苏、美、英为敌的“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为此，要加强陆军军备，使其“与苏联在远东能使用的兵力相对抗”，在同苏联远东军开战初期，“能给予打击”。要加强海军军备，“使其能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①把以苏、美、英为对手，夺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确定为日本的国策，是日本法西斯上台后的第一次，它表明日本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从国际到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准备，全面侵华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

法西斯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当“九一八”事变正在进行时，日本就已虎视眈眈，觊觎着中国本部，盘算着如何吞掉全中国。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在《满蒙自由国建国大纲》中，就将中国热河省列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②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在给日本参谋本部的电报中指出，热河省是威胁“满洲国”的“一大祸根”，因此，“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③于是，“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立即以东北为基地，对中国本部实行蚕食

① [日]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44页。

② [日] 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东京：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253页。

③ 同上，第490页。

政策。它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在“七七”事变前的短短5年中，迅速把战火从关外烧到关内，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到华北。

日本扩大侵略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伪满洲国”相邻的热河省。关东军先采取所谓“政治解决”手法，引诱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就任伪满参议府副议长，在遭到汤的拒绝后，便立即要求参谋本部增派一个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的兵力，决定用武力夺取热河。

1933年2月，关东军开始侵入热河。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主义，驻守热河的汤玉麟军不战自溃。3月5日，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4月越过长城，攻入河北滦东地区，逼近平津。当日军取得军事成功之后，就立即用外交手段加以巩固。5月30日，中日谈判在塘沽举行。31日，日方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拿出早已印刷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威胁说，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不容更改一字，中国代表只能在两小时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答复，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中方代表熊斌在敌人的嚣张气焰下屈服了，一字不改地接受了日方草案，正式签订了塘沽协定。^①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把河北滦东地区19个县划为“非武装地带”，它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产物，是“伪满洲国”成立后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协定。对日本说来，塘沽协定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从而也就使日本越过了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

日本利用这一协定，以重兵压迫关内，威逼平津，为它的下一步侵略行动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当日本在热河稳住阵脚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吧侵略目标指向了华北。日本的目的是要实现华北“自治”，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企图以最

^① [日] 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23页。

小的代价，收到最大的效果，不战而获得华北五省。它的第一步行动是削弱华北的武装力量，胁迫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撤出该地区。

1935年5月，日本借口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了华北非武装地带和天津两个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关东军遂以重兵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一带，随时准备入侵华北。5月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中央军调出天津和河北，禁止排日等，并公然将装甲车开到河北省主席府前示威。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屈膝退让，完全接受了日方要求，于6月10日作了口头答复：根据中央训令，全部接受日方要求。这就是《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它是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又一个丧权辱国协定。

在此前后，日本特务在张家口被中国军队拘留。6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此为借口，命令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赔罪，在察哈尔设立非武装地带，二十九军撤出该地区，解散一切排日机关等。面对日本的挑衅，蒋介石政府继续妥协退让，主动解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行政院长汪精卫甚至无耻地说：“我们如果受人压迫去做，不如先就自动地去做。”一副投降派嘴脸暴露无遗。6月23日，土肥原威胁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说，如果中方不同意，他就不谈判了，这就意味着要采取军事行动，于是秦德纯全部接受了日方要求，27日正式生效。这就是《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它同样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何梅、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华北五省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成了日军可以任意出入的“真空地带”。于是，日本的第二步行动，就是要把这个“真空地带”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华北国”。

早在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通过的《根据国际关系的观察制订的时局处理方针》中就注意到，“在中国本部，地方政权的分立状态日益显著”。^①1933年5月5日，关东军参谋长在给参谋本部次长、陆军省次官的电报中，就提出了在察哈尔东部“扶植亲日亲满势力”的建议。同年4、5月，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就策划，鼓动宋哲元、张作相，使其与旧军阀张敬尧合作，用旧军阀的军队在北京发动政变，建立以吴佩孚为首领的亲日政权。1934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华各地的武官多次密谈，曾设想联合华北各军阀和西南军阀，南北夹击国民党政府，造成中国分裂局面，以分而治之。《何梅协定》签订后，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曾设想，以平津地区的宋哲元为中心，联合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实现华北五省自治。

1935年9月2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实现“华北经济圈的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权的管辖）”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②这个声明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实现“华北自治”的要求，彻底暴露了日本吞并华北的狼子野心。正如当时中国舆论所指出的，多田的声明说明，“日人在最近必完成其囊括华北，侵略西北之计划”。10月中旬，关东军将特务头子、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派遣到华北，加紧华北分离计划的实施。当山东的韩复榘和山西的阎锡山拒绝参加五省自治时，土肥原便策划成立以宋哲元为中心，辖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华北协同防

① [日]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文书》，第207页。

② [日]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东京：原书房1979年版，第56—57页。

共委员会”，预定于11月2日发布成立宣言。但在中国人民抗日浪潮声中，宋哲元不敢同意。土肥原不得已，只得成立了一个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这是日本在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它是一个受到全中国人民唾骂、毫无影响的伪政权。该政权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日本分离华北的成功，而意味着它的失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1935年12月18日，自动成立了一个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和平津地区。这是一个既同日本有联系，又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的半自治政权。该政权的成立，又给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在推行分离华北阴谋的同时，日本又把另一只黑手伸进了内蒙。关东军一向重视内蒙，认为它在未来的日苏战争中，是阻止苏联机械化部队从外蒙到天津方面南下的“战略要线”，因此，关东军企图把满洲（东路）、内外蒙古（中路）、新疆（西路）连成一线，筑起一道防苏屏障。^①为此，“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直在内蒙支持亲日派，进行分离内蒙活动。1936年4月23日，由关东军一手扶植起来的伪蒙古军政府终于成立。

为了达到分离华北的目的，日本极力排斥美英在华势力，切断中国与美英等国的联系，以便独霸中国。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后，美英不甘心由日本独占在华利益，便给国民党政府一些经济援助来对抗日本。美国给国民党政府5000万美元的棉麦贷款，并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其他西方国家也向中国派出专家，插手中国的交通业。这一动向立即引起了日本的关注。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对记者发表声明，俨然以中国太上皇自居，声称不准美英支持中国，反对中国“以夷制夷”，利用美英对抗日本。天

^① [日]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06—107页。